

# 鄧喬彬學術文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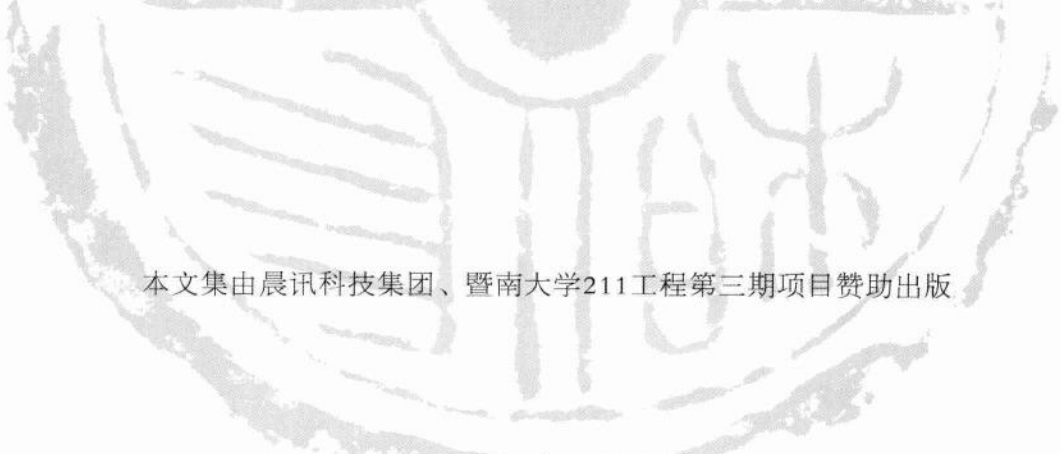
## 第七卷

### 词学论文集

邓乔彬 著



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



本文集由晨讯科技集团、暨南大学211工程第三期项目赞助出版

鄧喬彬學術文集

第七卷

# 词学论文集

邓乔彬 著



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

责任编辑:潘 安 何章艳

装帧设计:丁奕奕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词学论文集/邓乔彬著. —芜湖: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, 2013.8

(邓乔彬学术文集; 7)

ISBN 978-7-5676-0149-9

I. ①词… II. ①邓 III. ①词学—中国—文集 IV. ①I207.23-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2) 第 299760 号

## 词学论文集

邓乔彬 著

---

出版发行: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

芜湖市九华南路189号安徽师范大学花津校区

邮政编码:241002

网 址: <http://www.ahnupress.com/>

发 行 部:0553-3883578 5910327 5910310(传真)

E-mail: asdchsfxb@126.com

经 销: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安徽芜湖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
版 次:2013年8月第1版

印 次:2013年8月第1次印刷

规 格:787×1092 1/16

印 张:31.25 插 页:4

字 数:687千

书 号:ISBN 978-7-5676-0149-9

定 价:62.00元(平装) 72.00元(精装)

---

凡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版图书有缺漏页、残破等质量问题,本社负责调换。

## 总 序

孔子说：“吾十有五而志于学，三十而立，四十而不惑，五十而知天命，六十而耳顺，七十而从心所欲，不逾矩。”我今年七十周岁，应以之对照反省并思考其中原因了。

孔子以六艺授徒，实行全才式教育，我于1956年考入华东师大附中，勉强可算“十有五而志于学”，却已开始偏科。试前突击可考数、理、化优良，日常所好却为文哲、史地与艺术。高中再入师大附中，不久就被调到区体校，虽安排就读于同是名校的复兴中学，兴趣使然，偏科更为严重。直到高三，情况始变：体校为兼顾运动会得分和高考录取率，全班仅剩十七人，在最小的教室上课，一流老师讲课，我虽近视未戴眼镜，仍看得清又听得明，能集中思想学习。我不仅是文、史课代表，空间解析几何、有机化学等课程的测验、考试也几为全优。学业之进，使我误以为自己能做到文理兼长，因看到了历年对《红楼梦》研究、对胡适思想、对诸多文艺现象和人物的批判，深感“文科危险”，于是，在高考的选择上，决定报考理工科。我有绘画之长，又爱制作船模，原欲报考同济大学建筑系或上海交大造船系，后来却突然生变。原因是：在六月举行的上海市中学生运动会体校组比赛中，我获得跳高冠军和三项全能亚军，被观战的华东师大体育老师相中，劝我报考师大。他告以师大物理系毕业生多分配至高校或科研单位，到中学的仅百分之五。而因经济困难，我曾对父母许诺读大学不要家里负担，师范生由国家提供膳食，能不爽所约，故而听从所劝，改以华东师大物理系为第一志愿，并被录取。

入学后，开始还信心满满，但随着时间推移，却对学习越来越不感兴趣。尤其是高等数学，常布置几十道题，有时竟然半天也解不了一题，使我深感烦恼。有次实验，一女同学失手损坏了仪器配件，被命赔偿，她的痛哭使我难以平静，就此视实验为畏途。我住在运动员宿舍，见文科生毫无作业、实验负担，同室一位羽毛球队员读中文系，是印尼归侨，曾说：“我们的同学真厉害，高中就读过《三国演义》、《水浒传》、《红楼梦》！”听此叹慕，我心中暗笑：“这些小说，鄙人小学时就读过了，岂

止读过，人物和情节都能随口说出！”我深感文理科的苦乐不同，心想：“毕业后拿一样的工资，何必要读物理系？学得如此之苦！”为此，因高考弃长取短、选择了理科而后悔，开始有转系之念。

那时的高校，转系极难。我先向物理系提出转读中文系的申请，未得理睬。后听说，有一数学系转中文系的学生，曾向市委书记柯庆施写信，历尽周折才得批准，且必须从一年级读起。我当然不愿去中文系“留级”，更不愿在物理系勉强升级，决定破釜沉舟、“舍命”一搏。于是，所有的专业课都亮起“红灯”，以证我不宜在物理系学习；同时，正式提出转读中文系二年级的申请。在受阻于物理系、教务处之后，我决定写信给校党委书记兼副校长常溪萍，申明要求转系的理由。常溪萍抗战时入党，曾是山东的模范专员，保持老八路本色，经常出现在学生宿舍、食堂和运动场，爱打篮球，曾多次看我跳高，认识我。我刚入学，就在新生运动会上破了校纪录。1963年参加高校运动会，所有高度都一次过杆，最有希望夺冠，却在跳1米86时，心想过此高度将集冠军、高校纪录和一级运动员于一身，杂念一生，三跳失败，仅获亚军。虽如此，我仍是华东师大田径队的“希望之星”。我候在丽娃河桥畔，见他经过，把信交他手上，只说：“常校长，这是我要求转系的信。”转身就走。不久，教务处约我谈话，认真听取我要求转系的理由，后又同意我参加中文系考试，以决定能否转读二年级。事后得知，这是奉常校长所命而办，而常校长之所以同意我转系，主要不在于我是学校的优秀运动员，而是通过查阅高考作文卷，知我所写《雨后》一文似是得了理科生的最高分，这是可以转读中文系的重要理由和依据。

因期末考试已过，我被安排参加中文系一年级的补考，所有课程都通过，优多良少，我终于没成为“留级生”，在1963年下半年转到中文系二年级就读。这年冬天，成为一级运动员，自感学习上驾轻就熟，大有余力读书。次年春，我以1米92打破1米86的上海高校跳高纪录，距新的运动健将标准仅3厘米，是全校最有希望成为健将的人选。我开始酝酿学习与体育双优的计划，期待毕业能留校工作，走上高校教学和文学研究的道路。

但是，在中文系仅读了一年，1964年10月，全年级同学就被命参加“社教”工作队，到安徽农村搞“四清”。先是“访贫问苦”、“扎根串连”，后是“整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”，从全椒县到定远县，先后参加了三期运动。1966年5月，结束“社教”，恢复了大学生身份，

回到学校。但随即“五一六”通知下达，“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”真正拉开序幕，我在无“学”、不“学”的大学度过了“乱也看惯了，篡也看惯了”的两年多。好不容易在被拖一年后，于1968年毕业分配。五年制的大学六年毕业，我实际上只读了一年物理系，一年中文系，在“四面向”（厂矿、农村、基层、边疆）的潮流中，被分到甘肃永登水泥厂。服从建材部安排，我于1968年9月到江苏南通长江边的东方红农场，接受解放军的再教育。战天斗地，劳动一年半，于1970年3月结束锻炼。5月初到甘肃永登水泥厂报到，开始在黄土高原的山沟接受工人阶级的永久性再教育。

我先被安排随政工组挖防空洞，后到原料车间，每天推小车，数月后，再被分到班组，当了三班倒工人。一年多后，职工子弟小学一位体育教师调回老家，厂政工组找我谈话，令去学校顶缺，理由是我不久前获兰州市首届运动会跳高冠军，教体育很合适。我认为自己虽能当专业教练却教不了小学体育，在压力之下还是顺从了。每天面对小麻雀般的一二年级小学生，和“我们今天玩什么”的发问，我只能摇头苦笑，唯求不出意外，何有教学可言！一年后，我改任职工子弟中学的军体课，课闲还曾满怀热忱训练学生田径队。后被同事告知：校长对我教体育穿运动鞋和运动服、戴太阳帽（均自费购置）很不满，认为是资产阶级作风，差点过不了转正一关。在教了近两年军体课后，我“归队”当语文教师，而因“阶级”的嫌疑，冷却了对学校体育事业的热心。

很快就到了“而立”之年。难出于时代之外，此时的我是不“学”又未“立”。应付每周十二节语文课兼一个班的班主任，每周三个晚上的学习毛选、马列，是极其容易的。在“知识越多越反动”的年代，不必“给人一杯水，自己要有一桶水”，此时除了马列、毛选，实在无书可读，我仅是利用为厂文艺宣传队创作节目的机会，借口找参考书，在厂图书馆发现了几本藏在角落的外国小说，读了以前未读过的梅里美《嘉尔曼》、《高龙巴》等书。

黄土高原的杨树叶生生落落，我的生活在“看人儿女大，为客岁年长”中循环……终于到了1976年，周恩来、朱德先后逝世，唐山大地震，毛泽东逝世……不久，传来了一举粉碎“四人帮”的消息，举国欢庆之后，很快就是一系列的拨乱反正。终于，在1977年听到了恢复高考的喜讯，不久又传来研究生招生的消息。“伤痕文学”的出现，促使人们反思“文革”，陈景润攻克“哥德巴赫猜想”的报告文学，更鼓舞了许

多人,“志于学”的时代终于来临了!我在1978年春报考了古代文学研究生,以母校华东师大为第一志愿,在永登县城参加考试,除俄语外,其他三门课自感较好。在等待中得到了复试通知,却因夏天的洪水冲断宝天铁路,只能向厂领导申请乘飞机回沪,且不顾只准飞兰州到西安的批示而直飞上海,参加复试。9月,收到录取通知,我成为了“文革”后“黄埔一期”研究生,得以从中年开始“志于学”。

三年研究生,是我真正的读书期。深感本科六年、毕业十年的无学,蹉跎岁月之痛,激起了学习的热情。我尽废以前所好,停止了体育锻炼,渐入学术之门。1981年,研究生毕业,留校工作,既是我学术研究的继续,又是逐渐开拓的起始。很快就进入“不惑”之年,对于人生之途自无所“惑”,而对学术问题则“惑”者甚多,因之而兴趣渐广。我先是为写研究吴梅的硕士论文而用力于戏曲和曲论,后因兴趣主要在词而转向唐宋词与词学批评,以上研究领域的相关成果分别是《吴梅研究》与《唐宋词美学》二书及参撰的《中国词学批评史》,还有多篇词学论文。而因唐宋词与词学批评分别被同事设为选修课,且作为科研主攻方向,我就避之而将研究转到了古代诗画比较。这一转向并非有意作跨界研究,而是或因我青年时对诗画皆有所好的“情结”所致,此时因浸淫学术而多了几分中年的理性,虽未用力于诗画创作,却对研究二者尤其是比较其异同感兴趣。遂从钱锺书先生的两篇论文及所提出的问题出发,写出了古代诗画比较的讲稿,以此稿开了多年的选修课,并据此而写成、出版了《有声画与无声诗》一书。此书被一书评称为“中国的《拉奥孔》”,虽或过誉,但也确是点出了构建中国古代诗画比较理论体系,揭示民族特色的意旨。

《吴梅研究》初稿成于1981年,出版于1990年底,历时近十年;《有声画与无声诗》成稿五年后,才于1993年出版。《唐宋词美学》1993年出版,《中国词学批评史》1994年出版。以上四种著作,都出在五十岁左右。而因前两者的出版历尽艰难,使我真正懂得学术研究成果的面世受制于市场,这就改变了以前的观念,大概可算是我的“五十而知天命”了!

虽然上述的专著、合著都出版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,却是我八十年代“学”之所成,所以这十年之所“治”,主要是词曲与诗画之学。

1988年起,我受命参与华东师大文科第一个复合型硕士专业的筹建,开始指导这一名为“中国文化建设”方向的硕士生,又有授课的任务,

遂用了很多时间阅读文化学、文化史著作，结合我国古代的文学与艺术，写成《中国文化与文艺》讲稿。除了为这一方向的硕士生授课外，又在中文系各层次、范围的学生中以选修课讲过多次。在讲述十年后，写成《古代文艺的文化观照》一书，作为我主持的教育部项目成果，在2003年出版。在研读文化学、文化史的过程中，我一度对图腾、民俗颇感兴趣，曾费时费力地借助放大镜阅读影印版《二十五史》，企图从古史记载中寻找图腾制的遗迹，欲写《中国图腾艺术史》。此事虽未行，却因对文化学、文化史及中国古代史著作的阅读，引发出对史前文艺与神话研究的兴趣。适逢中文系有人主持撰写二十世纪中国美学研究丛书，以人为题，确定了十位对象，将其中的闻一多研究交给我，我虽因读了俞兆平的《闻一多美学思想论稿》而自感难以再作全新之论，却因对闻一多用文化人类学方法研究神话、《诗经》的兴趣，而将论题扭转到对闻氏的古代文学研究作文化的观照，与赵晓岚合作，写成了《学者闻一多》。

与上述研究几乎同时，我又延续了对诗、画的研究兴趣。《有声画与无声诗》出版后，因感到西方是力图拉开诗与画的距离，而我国古代却着力于诗画的融合，可是，诗与画毕竟所属不同，艺术介质、手段有异，虽可比又不可比，为此而生分写《中国诗歌思想史》与《中国绘画思想史》之念。我以先生后熟为原则，先作后者，全书百万字，始于1994年，因有集体项目和教学任务，主要用暑假写作，耗时四年才完成，也同《有声画与无声诗》一样，经历了曲折的过程，才在成稿三年多后出版。此时，已入新世纪，同事萧华荣的《中国诗学思想史》已出多年，使我只能将另一选题调整为《中国诗歌艺术思想史》，却因对能否出版的疑虑，令我不敢贸然动笔。而因2002年接受暨南大学之邀担任古代文学学科带头人，则更使我的生活发生了很大改变，这一写作计划终未能实施。近十年之后，出版拙著《中国绘画思想史》的贵州人民出版社要我自报选题，争取国家出版基金资助，而此时经历了一场大病，我的健康状况已不允许再写大部头著作。于是，我的诗画之学就只能终止于这种跛腿的状态了。

九十年代的十年，我的治学既延续了诗画之学而偏在绘画，又新辟了文化与文艺的宏观关系研究，还在学术史范畴以学者为对象继作“研究之研究”。以上三方向的成果，就是分别出版于2001年的《中国绘画思想史》，2003年的《古代文艺的文化观照》，2001年的《学者闻一多》。三著的出版，在我六十岁左右，此时的辨识力已较前为高，虽非和

光同尘，却听到的多能泰然入耳，看到的也见怪不怪，虽无反潮流的勇气，却能不跟风而动，此或为我的“六十而耳顺”之义。

2002年底，为申报古代文学博士点及中文一级学科博士点，我被借调到暨南大学，担任学科带头人，次年，前者得批，后者未就，我正式调入暨大。河南大学出版社的《宋代研究丛书》已出多种，或因我有《中国绘画思想史》之作，向我约写《宋代绘画研究》。成约于2002年6月，而因我的调动，应对多事，虽只用了半年多撰稿，成书却已在2004年8月，出版则是2006年10月了。我的学术兴趣屡转，虽不怕“学书不成学画，学画不成学塑”之讥，却因只问耕耘、不问收获，从未在各界求取认同，故似只有词学界还将我看作“自己人”，因此而有回归词界之想。我先应上海古籍出版社之约写了《宋词与人生》，又在该社出了《词学廿论》，在齐鲁书社再版了《唐宋词美学》，以维持先入为主的词学学者形象。2004年，国家社科基金项目“唐宋词的形式与艺术发展史”获批，为应对考核而发表了30多篇论文后，我在2007年一年内完成了《唐宋词艺术发展史》的百万字书稿，三年后正式出版。

我曾有二十年的体育锻炼和体力劳动史，自三十五岁重回大学以来，为追回岁月，就停止了锻炼，虽自感体能退化，却无明显的不适，为之还自我调侃：“青年时应是狮子老虎，老年时要像乌龟王八。”而实际上我不应提前进入“乌龟王八”状态，故从中年起已因久坐不动而疾病暗生。1999年，第一个验血指标高出临界，此后各指标逐年飘红，渐成“三高”人员，本应重启体育锻炼，却停不下高强度研究的脚步。因多年的连轴转，健康严重透支，终在2009年大病一场，躺上了手术台。此时，我才意识到体育锻炼确应是一生之事，对于运动员出身的人尤应如此。悔之晚矣，亡羊补牢，却已非其时！我只能停止了将要进行的研究，为自己的学术生涯不情愿地划上休止符。

从前曾流行过“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”的口号，我的真正为学始于三十五岁，应工作到八十五岁，但因健康亮起红灯，身患多种疾病，我只能止于七十。这本是“从心所欲，不逾矩”之年，我虽不逾法度规矩，却受制于健康而不能从心所欲了。有了这一清醒认识，我只能中止原先计划，仅在出版《唐宋词艺术发展史》后，于2011年再版了《中国绘画思想史》插图本，旋即开始整理三十多年的著作、论文，拟在七十周岁时出版自己的学术文集，就此将“换一种活法”，以度余生。这样，原先计划要写的几种著作都不能付之实施了。按先后，这些著作是：《进

士文化与唐诗》、《中国诗歌艺术思想史》、《中国韵文学概论》，以及力图构建新体系、体现“一代之所胜”的《中国文化史纲》，此外，还有一或两种词籍别集的校笺。

新著写作未成，旧作整理已就，如今，名之为《邓乔彬学术文集》的十二卷本将正式出版。十二卷文集分别是：

第一卷：《文化与文艺》，包括专著《古代文艺的文化观照》和相关论文七篇。

第二卷：《比较诗学》，包括平行比较与影响比较两个专题。前者是：专著《有声画与无声诗》，古代诗画比较论文一篇，中外比较诗学论文六篇。后者是：与陈学祖合作的影响比较研究书稿《现代新诗与古典诗词》三章。

第三卷：《文化诗学》，包括四组论文：文化与诗，十二篇论文；进士文化与唐诗，十二篇论文；诗歌美学，十篇论文；曲学及其他，十一篇论文。

第四卷：专著《唐宋词艺术发展史（上）》。

第五卷：专著《唐宋词艺术发展史（下）》。

第六卷：《词学三著》，分别是《唐宋词美学》、《宋词与人生》、《爱国词人辛弃疾》。

第七卷：《词学论文集》，包括：词学总论，十三篇；词人词作论，十三篇；词论研究，十篇；其他，八篇。

第八卷：专著《中国绘画思想史（上）》。

第九卷：专著《中国绘画思想史（下）》。

第十卷：《宋画与画论》，包括《宋代绘画研究》及研究绘画与画论的论文六篇，访谈一篇。

第十一卷：《学者研究》，包括《吴梅研究》与《学者闻一多》二著，及论述二人学术成就或研究方法的论文二篇。

第十二卷：《杂缀集》，包括六部分：第一部分是古代六十种画论著作所写的提要，第二部分是九十二篇古文的提要，第三部分为序跋后记，第四部分为学习笔谈，第五部分为发言、讲座稿，第六部分为作品赏析。最后附有作者分年度的著作、论文、文章目录。

回顾七十年的人生，恰以1978年三十五周岁为界：此前是在中学、大学偏科、移易的“志于学”与不能“学”之十多年，学工、学农、学军的数年，不能给人以学、自己亦不能学的工厂子弟学校教师的七年；

此后则是真正在高校的为学、治学，经历了不惑、知天命、耳顺、从心所欲而不逾矩的生命历程、节点。十多年的蹉跎岁月，即使放弃体育锻炼及诸般爱好，也难以追回！若老天能再给我以十多年的健康岁月，本应有逾千万的文字用于结集的，如今却只能止于古稀之年而仅得六百多万字。不过，人们常说，学问是做不完的，念此也就不必自责、自叹了。

本文集的出版，先得暨南大学第三期 211 工程经费的资助，所缺的大半费用由晨讯科技董事长杨文瑛女士赞助，在我筹款无门、不得已而向这位从无联系的初中同学求助时，立即就得到她的无条件应允，随即将钱款打入出版社账户。对此，实在是难以表达我内心的感激之情！本文集的整理、出版，得我沪、穗两地历届的博士生、博士后助力甚多，分别负责各卷的整理、校核者是：

第一卷：刘兴晖、金国正

第二卷：陈学祖

第三卷：彭国忠

第四、五卷：刘兴晖、昌庆志

第六卷：吴思增、王毅

第七卷：杨柏岭、仲冬梅

九卷：李杰荣、刘兴晖、王嘉、陈建穰

第十卷：何平华、汪涤

第十一卷：李俊（委托刘晓亮）

第十二卷：程刚、夏令伟

文集能顺利出版，衷心感谢他们！

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将本文集列为重点图书，社领导统筹安排，诸位编辑兢兢业业，特此致谢！

围绕为学主题，回顾五十多年人生历程，权以为序。啰嗦之至，望读者谅之！

邓乔彬

2013 年 5 月 22 日

# 目 录

## 词学总论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文学、音乐的辩证发展与词体的生成 .....   | 3   |
| 盛中唐词的文化之变 .....          | 13  |
| 进士风与晚唐词 .....            | 22  |
| 词的由中唐至宋初之变与文化转换 .....    | 35  |
| 士大夫文化与北宋前期词 .....        | 46  |
| 论北宋中期词的变化 .....          | 66  |
| 宋徽宗朝的大晟词与谐谑词 .....       | 76  |
| 宋孝宗前期词坛纵论 .....          | 93  |
| 论南宋风雅词派在词的美学进程中的意义 ..... | 105 |
| 唐宋词的伤春主题及原型意义 .....      | 114 |
| 论宋词中的“骚”、“辩”之旨 .....     | 125 |
| 论豪放词 .....               | 136 |
| 宋代的俗词 .....              | 172 |

## 词人词作论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飞卿词艺术平议 .....           | 187 |
| 风云气少 儿女情多——温庭筠词浅尝 ..... | 195 |
| 东坡词简论 .....             | 198 |
| 秦观“词心”析论 .....          | 207 |
| 简论李之仪的当涂词 .....         | 219 |
| 驿骑苏秦间——陆游词风格及成因浅议 ..... | 228 |
| 论姜夔词的清空——姜词艺术析论之一 ..... | 237 |
| 论姜夔词的骚雅——姜词艺术析论之二 ..... | 249 |
| 梦窗词艺术初论 .....           | 259 |
| 浅论姜、张词风之异同 .....        | 266 |
| 周密及其《绝妙好词》 .....        | 276 |
| 论碧山词的寄托 .....           | 281 |

|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《弹指词》浅尝 ..... | 293 |
|---------------|-----|

## 词论研究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张炎《词源》的雅化理论 .....               | 315 |
| 沈义父《乐府指迷》的作法技巧理论 .....          | 328 |
| 诗化理论在南宋的发展 .....                | 337 |
| 郭麐《词品》析论 .....                  | 345 |
| 论刘熙载的《艺概·词概》 .....              | 359 |
| 况周颐的词心、词境论及“重、拙、大”说 .....       | 376 |
| 传统词学批评的终结与新变——论王国维的《人间词话》 ..... | 393 |
| 《人间词话》境界说给词学批评的启示 .....         | 415 |
| 王国维的《人间词话》 .....                | 425 |
| 《人间词话》的境界说 .....                | 428 |

## 其 他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词坛拨乱反正的功臣——对吴世昌先生反对论词“二分法”及重新评价苏轼词的体会 ..... | 433 |
| 吴世昌先生的词史观 ....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442 |
| 叶嘉莹词学研究的“兴发感动”说 .....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454 |
| 首届词学讨论会召开 ....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463 |
| 第二次词学讨论会纪要 ....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466 |
| 更新观念以求突破——第二次词学讨论会述评 .....                  | 469 |
| 话题选择与阐释思路——邓乔彬教授词学访谈录 .....                 | 473 |
| 《唐宋词的形式与艺术发展史》的自我鉴定 .....                   | 481 |
| 存 目 ....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486 |

# 词学总论



## 文学、音乐的辩证发展与词体的生成

我国的古代文学始于诗歌。较之其他文明古国,我国诗歌重在抒情,而不像希腊、印度之以叙事为主。经先秦、两汉、魏晋南北朝的发展,到唐代,诗歌各体皆盛,五七言近体更达到高峰,一种倚声而作的曲子词也应运而生,是为后世所称之词。

词本名曲子,后来才称为词。王重民先生《敦煌曲子词集·叙录》指出:“是今所谓词,古原称曲子。按曲子源出乐府,郭茂倩称曲子所由脱变之乐府为‘杂曲歌辞’,或‘近代曲辞’……是五七言乐府原称词(即辞字),或称曲,而长短句则称曲子也。特曲子既成为文士摘藻之一体,久而久之,遂称自所造作为词,目俗制为曲子,于是词高而曲子卑矣。”词之名既出,虽别称仍多,如曲子词、歌曲、乐章、乐府、近体乐府、寓声乐府、琴趣等,但约定俗成,其名自立,且从广义的诗歌中独立而出,而尤盛于宋。王国维以之与此前的楚辞、汉赋、六朝骈文、唐诗,此后的元曲并列为“一代之文学”。对于唐代的“歌诗”变而为词,且盛于宋之缘由,王骥德曾说:“入唐而以绝句为曲,如《清平》、《郁轮》、《凉州》、《水调》之类;然不尽其变,而于是始创为《忆秦娥》、《菩萨蛮》等曲,盖太白、飞卿辈实其作俑。入宋而词始大振,署曰‘诗余’,于今曲益近,周侍御、柳屯田其最也……”<sup>①</sup>

词虽一代之胜,而作为古代诗史的一个链环,其由来不仅限于唐宋,观照其发展之由,应置于古代诗歌的流程中,且要在以下几方面关注影响其体式生成的基础和主要制约因素。

### 一 齐言与杂言的转换

汉语与西语的最大不同,在于表义而非表音,其开始于单音节的语言,决定了诗歌的主要民族特色。随着语言的发展,双音节词汇渐多,汉语及其节奏影响了诗歌的体式,而尤见于句式由短而长的变化,也随之产生了齐言与杂言的不同。

我国古代诗歌在形式上的发展变化主要体现为齐言与杂言的转换。

最早的诗歌是以齐言为主而兼有杂言的。如《吴越春秋》卷九《勾践阴谋外传》所载的《弹歌》为二言:“断竹,续竹,飞土,逐肉。”而《帝王世纪》卷二的《击壤歌》传为帝尧时期的歌谣,则为四言基础上的杂言:“日出而作,日入而息,凿井而饮,耕田而食。帝力于我何有哉!”又,《礼记》卷八《郊特牲》的蜡辞亦近之:“土返其宅,水归其

<sup>①</sup> 王骥德.曲律[M]//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(四).北京:中国戏剧出版社,1959:55.

壑,昆虫毋作,草木归其泽。”此传为神农氏所作,虽不可信,但仍是早期歌谣。近似的还有《淮南子》卷十八《人间训》所载《尧戒》:“战战栗栗,日慎一日。人莫蹏于山,而蹏于垤。”

早期歌谣多为齐言的四言,而实际上有的确为四言,如《列子》卷四《仲尼》的《康衢谣》:“立我蒸民,莫匪尔极。不识不知,顺帝之则。”而有的则是三字句加上一个虚词,如《尚书》卷二《益稷》的《君臣赓歌》:“股肱喜哉,元首起哉。百工熙哉,元首明哉。股肱良哉,庶事康哉。”《尚书大传》卷下《虞夏传》的《卿云歌》:“卿云烂兮,糺缦缦兮。日月光华,旦复旦兮。”

因为古歌谣有被后人改动或伪托的情况,所以相较而言,殷墟发掘的商代卜辞更为可信。载于郭沫若《卜辞通纂》的《癸卯卜》其实就是一首诗:“今日雨?其自西来雨?其自东来雨?其自北来雨?其自南来雨?”除第一句,皆每句五字,而除去表疑问的“其”字,则为一首四言诗。

自《诗经》以来,古代诗歌呈现出齐言与杂言的两次大转换。

《诗经》中产生较早的《周颂》,句式多未定型,是不整齐的,稍后的大小雅,句式变为整齐,逐渐定型,尤其《小雅》的不少诗篇与国风几无差别。风诗多重章叠句,反复歌咏,虽也有二、三、五、六、七、八言者,但基本以四言为主。《诗经》以国风为大端,使句式之四言成为了与后世诗歌的显著区别。

《楚辞》自其前身的楚歌起,就与《诗经》不同,体式较多变。如《说苑·正谏篇》所载的《楚人歌》:“薪乎菜乎!无诸御己,讫无子乎!菜乎薪乎!无诸御己,讫无人乎!”为四言体,且重章反复,近于国风。而《论语·微子》所载的《接舆歌》:“凤兮凤兮!何德之衰?往者不可谏,来者犹可追。已而,已而!今之从政者殆而!”则为杂言。此歌在《庄子·人间世》中篇幅变长,且以四言为主,怀疑是经后人仿《诗经》作了改动。另一首《孺子歌》见于《孟子·离娄》:“沧浪之水清兮,可以濯我缨。沧浪之水浊兮,可以濯我足。”若除去“兮”字,则为五言诗。《楚辞》继承了《诗经》的四言体,又吸收了战国时期的散文句式,成为杂言体。虽屈原早期所作如《橘颂》、《天问》为四言,《离骚》若除去“兮”字基本为六言,但《九歌》却长短参差,至宋玉《九辩》,更见错落变化。因此,《楚辞》总体上可认为是杂言诗。汉乐府以楚声为主要音乐来源,加以新声乐的因乐系辞,故以杂言为主。

由上可知,从《诗经》到汉乐府,是齐言转换到杂言的第一个周期。

汉代开始五言诗的创作后,从最初的“质木无文”,发展到如汉末《古诗十九首》那样的兼备文质,使得在重文而轻乐同时,诗歌又回归于齐言,自此成为文人诗的主要形式。同时,杂言的乐府诗一直在继续着,历魏晋南北朝而至隋唐,皆如此。虽此期实际上存在着诗乐分(文人诗)与合(乐府诗)的现象,但可视作是齐言与杂言并存的时期。

自“永明体”产生以来,诗歌逐渐进入“近体”阶段,经隋唐两代,五律、五绝、七律、七绝遂成为诗歌的主要形式,而律、绝的成熟,则使得齐言诗的基本形式为之定型。唐